

【主持人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我们认为，这段话对于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及中华传统文艺思想史研究，具有价值导向与学术引领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文化自信意识，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艺思想传承发展意识和学术使命，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研究，挖掘其中蕴含的丰富的精神义理和诗性智慧，并且结合时代的要求，进行创造性阐释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传统优秀文艺思想在不断传承发展中展现出其固有的人文魅力，并且对新时代中国文艺思想发展起到固本筑基、滋养根脉的作用。本栏目即根据这一旨意而开设，所刊发的2篇论文，针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具体学术问题，进行探索与讨论，以期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论。

回到原点：再论传统文论诠释中的视界融合问题^{*}

党圣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视界融合”问题，既关涉到研究理念与价值取向，又关涉到学术方法论。在当前强调文化自信、文化自为，强调通过创造性阐释与创新性转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文化语境中，更是直接关系到中华传统文学与文论精神义脉的传承和创造性阐释与创新性转化。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需要反思的现象，我们应该进一步强化“视界融合”这一问题意识，在对中华传统文论精神义理进行体认、阐释时，要树立文化自信的意识，强化文化根脉的观念，秉持回到文化原点的学术方法与理念，具体而言就是要回到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史、文学史和价值论的语境，打破西方文论作为普适性的元理论问题的迷思，追求古代文论研究中古今之间“文化视界”的深度融合，重新梳理困扰了学界一个世纪之久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疏浚古今文论之间文化根脉的传承与统序关系，而只有在此基础上，传统文论之于当代中国文论的资源价值才会不断地释放出来；只有真正具有自主性的文化视界，才能与其他文化视界形成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 传统文论；文化原点；诠释循环；文化视界；视界融合

【中图分类号】I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8)01-0047-12

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视界融合”问题是一个既关涉到研究理念与价值取向，又关涉到学术方法论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深入讨论。尤其是在当前强调文化自信、文化自为，强调通过创造性阐释与

^{*} 【作者简介】党圣元，男，陕西榆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化理论研究。

创新性转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文化语境中,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视界融合”问题,更是直接关系到中华传统文学与文论精神义脉的传承和创造性阐释与创新性转化,因此需要充分关注。笔者曾在 10 多年前撰写发表过《传统文论诠释中的视界融合问题》一文,^①对相关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的讨论,今再申说,所言为芹献,但求方家不弃,多多赐教。

—

以西方文论为模式样本,“西体中用”“以西解中”,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据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的学术理念与方法,其利弊得失均在于此。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检视之:(1)从中华学术现代转型和体制建构,以及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生成而言,“援西入中”“以西解中”体现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中国古代文论只有参照并纳入西方文论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中进行阐释,运用“他者”的目光来审视之,以“他者”的尺度来裁取之,方才可以取得阐释的“合法性”,在中国现代学术版图中获得立足之地。(2)从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阐释史来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划分为“文学理论”“文艺学”学科,而要在作为现代学术的“文学理论”体系中获得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最为可行的就是必须将不以体系(相对于西方文论的“体系”而言)取胜的传统诗文评纳入以西方文学理论的观念、知识、话语体系为“铸范”的模式中来冲压、形塑、再造之,使其在注入“现代性”的必要前提条件下再生为“文学理论”“文艺学”。因此,传统诗文评的现代学术整合重构、现代阐释、现代书写过程,即是其与西方文学理论“相向而行”的体系化过程,而在此过程中相当程度上放弃自身的文化自性,“援西入中”“以西解中”便也成为一种必然。(3)在此过程中,以西方文论、哲学的理论框架、言说方式为模式来裁剪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成为必不可少的知识论、方法论工具,也是无法避免的选择。(4)为了易于使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纳入西方文论的阐释体系之中,便将传统文论中的那些具体的范畴、概念、命题,从其思想文化史、文学史语境、批评史语境中剥离出来,使其就范于西方文学理论,而实质上成为西方文学理论之附庸或“页下注”。(5)由此而来,便产生一个预设性的理论前提,即西方文学理论具有普适性,而中国古代文论普适性较弱,或者说仅仅具有地方性,因此必须使用西方文学理论工具对其进行再加工。

对于以上所讲的传统文论研究中的“西体中用”“以西解中”,及其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功效,需要一分为二来看待,不可断然决绝地判定对与错,而且对这一现象进行评价的眼光也不能固定在某个点上而不与时俱进。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国古代文论现代研究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建立在“西体中用”“以西解中”基础上的中西文论视界融合史,在此过程中,势必会产生种种表现形态不一的对传统文论失去文化自信,轻蔑、否弃传统文论中的一些真正能体现本民族文化根脉、思想自性、美学精神的成分,则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今天反思这样的研究范式,并非是反对当代中国文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中的中西文论视界交融,而恰恰是为了将中西文论互看的视界打得更开,从而更加充分地展示传统文论思想、知识之丰富性。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之于我们现在的文学活动之价值,不在于直接指导当下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以及完全套用传统文论来对当下具体的某一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进行诠释。因此,试图从传统文论中原封不动地搬来一套话语直接用于我们现在的文学活动乃至西方的文学活动进行分析阐释,这样的想法功利主义色彩太过于浓重,并且事实上也很难奏效。传统文论对于当代中国文论的意义和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具有的文化根脉、人文情怀、理论话语资源及其传承方面,其既可以开阔当代中国文论研究者的人文思想情怀和理论视野、历史意识,又可以彰显人类文学思想之丰富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时这样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

^① 党圣元.传统文论诠释中的视界融合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6).

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根本、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①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文论理论话语体系应该具有自己“固有的根本”，应该扎根在中华民族自己的思想文化沃土之上，应该在创新性转化中传承中华文脉，而如果继续像以往那样以单一的西方文论为视界，则势必使当代中国文论的视界越来越狭窄，以致总是死死地盯着西方文论，并且亦步亦趋地仿效，漠视与传统文论的融会贯通和文化统序方面的整合、建构、新创，缺乏对于传统文论诗性智慧的汲取，脱离自身“固有的根本”专意作横向移植并以此来置换“根本”，显然与当下通过创新性转化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文化建设主题不相称符。

其实，“以西解中”之中的“西”与“中”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的内涵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着的。在以往研究中所谓“西”主要是指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思想，这种启蒙现代性所倡导的“理性”被认为既是超文化的也是超历史的，万古如斯而放之四海皆准，这种超越文化时空的超级形而上学，在西方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在其内部就开始受到质疑了，而质疑也是从文化时间和文化空间两方面展开的：从文化时间上来说，西人揭示“现代性”本身也具有“历史性”，由此产生所谓现代性危机等；从文化空间上来说，西人自己也揭示，所谓超越文化地域的“理性”，很大程度上，其文化内核恰恰主要是“西方的”，他们自己已经对西方中心论有所质疑，在考量自身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他们也开始反思西方以外的异质文化会发挥什么作用（反思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对西方中心论能超越到什么程度且当别论）。如此，于我们而言，就形成这样一种悖论：即使要赶上西学也要对西学本身加以批判性反思了。“西”既然已有所变，“中”与“西”之间的关系必然也要有所变，新世纪中西文化关系显然已不同于上世纪初的中西文化关系了。然而，当西人自己开始质疑西方中心论时，我们则似乎还在自觉不自觉地落入西方中心论的陷阱，百年来我们总在跟西风而总跟不上趟的这一文化尴尬状况，致使中国现当代文论在发展过程中显现出了种种尴尬的“表情包”，这些“表情包”映照出了我们自己的文化面孔、文化心态，回看时但愿不要捧腹大笑。文化上中西关系的变化，根本上说是由新的世界整体性的社会历史状况造成的。比如，所谓“全球化”“跨文化”等问题，当然不是今天才产生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当下却也依然突出，以至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新问题。比如在旧殖民主义体系中，西方对非西方的控制主要是以暴力方式进行的，而那当然也是一种全球化。随着旧殖民主义体系的解体，暴力方式即使依然存在但也不是主导方式了，然而西方推动的全球化不是减速，而恰恰是加速了，但方式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变为主要以经济上、文化上或者两者“合二而一”的资本扩张以及与之相伴的文化、政治、价值观扩张等为主了。所以，亨廷顿才说21世纪是“文化（文明）冲突”的世纪。从文化关系上来说，一方面，在文化资本权力的控制下，非西方文化、价值观处境照样艰难，仍旧时时面临着受打压、被孤立和被染色的局面，因此很难谈得上与西方文化展开真正平等的“互动”“对话”；另一方面，挟持资本扩张、渗透威力的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依然具有极大的威胁，但毕竟为所谓互动、对话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更由于西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而导致的地域限制力量之趋于减弱，强势的西方文化在自身的扩张中也多少会融入非西方的文化因素，再加上全球治理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筑为标识的“中国力量”的出现，则文化多样性、文化多元主义的发展趋势已经成为一种事实存在。因此，即便从西方自身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来说，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也是非常有益的。

另外，“中”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上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晚清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我们学习西方文化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战胜”西方，或者至少是能与西方相抗衡，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普遍接受乃至信

^① 把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2-26.

奉或许表明:为了与狼斗,我们必须成为狼,说得理论化一点,也就是,能在西方文化游戏规则中与西方抗衡。而那时我们除了“西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中,我们关闭了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大门,而目的却与当初向西方文化学习的一样:抗衡西方。从中西关系近一个世纪的变化来看,如果说西方文化可能也已融入了一定中国因素的话,那么,一个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则使中国文化融入了——更准确地说是“过度”融入了——过多的西方因素,无论如何,从文化的交融来看,这绝对不是对等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综合国力获得了累积性的提升,经济等“硬实力”的提升,也为我们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较之过去,今天我们在文化上的选择就可以相对从容了,我们加入西方游戏规则的同时也可以初步发出自己的声音,并逐步朝着对此规则有所改变的方向努力。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向西方学习,但目的不再仅仅只是借助西方文化来彻底改造传统文化,而是为了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因为向世界先进学习文化也是振兴中华文化的一个需要。凡此种种,构成了当下中国传统文论研究的突出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时代语境,正是这一社会历史背景和语境,使我们今天可以相对从容地追求良性的文化视界融合及真正富于建设性的文化对话,而跨文化交流、文化多样性与丰富性,不仅仅是一种时代背景,而且还是世界文化整体发展的时代要求,这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论的价值,回到中华文论的原点重新发现和开掘于世界文论发展有益的思想资源等提供了极好的契机。

从一般意义上说,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是一种对传统典籍进行诠释的活动,其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通过诠释活动中的几种关系进行分析探究。对此,我们一直认为西方哲学诠释学的相关理论,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古今视界融合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反思百年来的古代文论研究学术史,古今视界融合问题,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然而又没有得到重视和解决的问题,而文化时间上的古今关系、文化空间上的中西关系,以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求是与致用、研究主体与对象客体、原典阐释与理论创新等诸般关系,均可以放置在“视界融合”语境中来反思,并且以融会贯通的文化姿态来析解之。

二

西方现代诠释学中的“视界融合”论,一方面强调对经典的诠释离不开诠释者的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又强调一切人文理论的创造离不开对传统经典的解读,在理论创新中诠释经典,在经典诠释中创新理论,这两个方面不能互相割裂。而我们以往研究中的一个不足之处正是经常将这两个方面相互割裂,导致了在古与今关系认识方面传统视界的遮蔽,中与西关系认识方面本土文化自主视界的缺位,以及科学与人文关系认识方面诗性视界的缺如。这些弊端又经常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并且衍生出其他诸多弊端。比如,传统视界的遮蔽导致了荣今虐古,荣今虐古又进而衍变为失去民族文化自信的西方中心论等等。高度重视历史传统,正是西方现代哲学诠释学“视界融合”论的一个基本学思倾向,其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尤具启发性。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阐释学重构、方法论改进方面,需要对上述问题进行反思和矫正,并且在解决好研思中的各种视界循环融合的过程中生成一种创造性研究视界。这种创造性视界的生成,表明传统文论对中国当代文论的体系和话语构建具有不可或缺的资源作用和价值意义,而不断地开掘传统文论资源,彰显其当代价值,正是需要我们在研究中予以强化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事关当代中国文论的文化自信、文化根脉。回到原点,实现古今视界融合,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一种方法论,应该是我们诠释传统文论时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以及应该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创造性转化的重要途径。

“视界融合”在近年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界得到较为广泛的重视,而这或许表明与此相关的理论与古代文论研究界长期普遍存在的问题有着某种相关性,这一概念的流行本身其实正是一场“视界融

合”事件。前已提及，中国文化一个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存在的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不断地“跟风”，当然主要是紧跟西洋风，这个毛病其实还不是出在所谓“拿来主义”，而是出在“食洋不化”，并又主要表现为对西方出现的一个个新潮观点的不断追逐，而对西方学术整体演进中的范式转换、深层思维方式的发展却反而知之甚浅。总体说来，不是西学的某些具体观点，而是其在最为基本的学术思维方式的进展，对我们自己学术研究的发展或许才更有启发，而我们学术界一大流弊却恰恰表现为：在一个个新潮观点上似乎与西方接轨了，在研究基本范式、学术思维方式上，却依然滞留在西方传统的窠臼之中。所以，如果从西方现代学术思维方式演进的角度，来理解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论，则此一理论的一大特点便是在对现代性危机反思的基础上对西方传统“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某种超越，而我们学术界对西人哈罗德·布鲁姆所谓“误读”的极端强调，以至于形成所谓的“误读有理论”，其实恰恰表明一些学者在最基本的学术思维方式上，仍然停留在西方传统的“主观主义”范式之中。当然，另一方面作为“反向翻版”的与唯科学主义相关的“客观主义”也不同程度地深植于一些研究者的学术思维之中。

“视界”德文原作“horizont”，中文又译作“视野”“视域”“地平线”“边缘域”等，此概念是当代西方哲学家伽达默尔在其哲学诠释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术语。伽达默尔是这样表述其观点的：

只要我们不断地检验我们的所有前见，那么，现在视域就是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被把握的。这种检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与过去的接触，以及对我们的由之而来的那种传统的理解。所以，如果没有过去，现在视域就根本不能形成。正如没有一种我们误认为有的历史视域一样，也根本没有一种自为的现在视域。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我们首先是从远古的时代和它对自身及其起源的素朴态度中认识到这种融合的力量。在传统的支配下，这样一种融合过程是经常出现的，因为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在这里总是不断地结合成某种更富有生气的有效的东西，而一般来说这两者彼此之间无需有明确的突出关系。

与历史意识一起进行的每一种与流传物的接触，本身都经验着本文与现在之间的紧张关系。诠释学的任务就在于不以一种朴素的同化去掩盖这种紧张关系，而是有意识地去暴露这种紧张关系。正是由于这种理由，诠释学的活动就是筹划一种不同于现在视域的历史视域。历史意识是意识到它自己的他在性，并因此把传统的视域与自己的视域区别开来。但另一方面，正如我们试图表明的，历史意识本身只是类似于某种对某个持续发生作用的传统进行叠加的过程，因此它把彼此相区别的东西同时又结合起来，以便在它如此取得的历史视域的统一体中与自己本身再度相统一。^①

伽达默尔在这里所讲的视界融合，涉及的是“过去（传统、流传物、本文等）”与“现在（解读、诠释者等）”之间的关系，而“融合”云云表述的则是两者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富于张力的关系，如果一味地偏执于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就会使这种张力遭到破坏甚至被废弛，以致无法形成良性的视界融合。就视界偏执而言，历史客观主义误以为存在着一种独立的历史视界，而主观主义则误以为存在着一种独立的现在视界，这两种情况看似截然对立，但实际上又都表现出过犹不及、两极相通的认识误区，即均认为文化的历史空间与现在空间可以相互隔绝、独立存在。西方思想的现代性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特点，就是在立论时预设出一个所谓只有颠覆传统、现代与传统断裂才可言创新这么一个思想发展逻辑，而西方思想中的这种思路对我国现当代文论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些热衷于移植西方现代性的中国学者坚信：现代中国文论必须与传统文论彻底告别，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形成现代中国文论的独立自足空间，而进一步的逻辑则是：中国文论要体现出充分的现代性，就应该彻底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

^①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393～394.

统撇清关系,去民族化、去本土化。然而,我们注意到西方文化和文论中现代与传统之断裂是发生在其自身内部的,而中国文化和文论中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则是受到来自其自身外部即西方文化的冲击、挤压而形成的。因此,如果说,西方文化和文论的现代性生成发展过程往往体现为与传统在一定程度、一定层面上的断裂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和文论的现代性生成过程则体现了与传统更全面、更深刻、更严重的断裂。比如,人们较为普遍地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只能用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来分析,传统文论对之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是通过移植、袭用西方文学理论发展起来的,那么事实上就成为适合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最终就只能西方文学理论,这样一来,西方文学理论便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独立存在的、自为的“现在视域”,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也就不能对这一独立封闭的“现在视域”形成任何影响了,并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丧失了诠释力,进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最多也就只具有纯学术研究的价值,而这正是认为古代文论不具有当代价值、无法进行现代转化说法的基本认识之一。必须明确一点,就是我们强调传统文论的当代价值,并非旨在复古,因为复古观念恰恰也是把研究视界封闭在独立自足的“历史视界”之中,这同样也掩盖了传统与现在之间的张力关系。我们强调传统文论当代价值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打破中国现代文论过于西化的单一化的“现在视界”,整合、疏通重建现代文论与传统文论传统之间传承赓续的文化统序关系。我们重视哲学诠释学视界融合理论,重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古今视界融合问题,出发点正在于此。

三

现代与传统、断裂性与连续性关系,涉及古文论研究中的视界融合问题,这些关系显然又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比如要发现和开掘传统文论中的精神价值,对其脱离语境的断章取义式的理解就行不通,而需回到历史文化语境,对其作“同情之了解”。

我们认为,现代与传统、断裂与连续之间应形成一种必要的张力,只有建构起这一必要的张力,古与今之间真正良性、深度的视界融合才成为可能。伽达默尔认为,文本与现在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人们不应该着意掩盖这种紧张关系,而应该有意识地去揭示这种紧张关系。他还认为,这种紧张关系对于现代精神科学之解释学情境而言,是“标志性的张力关系”“不将过去与现在的张力关系在一个匆匆等同中掩盖起来就是历史意识的成就”“效果史的效果属于整体;精神科学家的解释学情境总是介于陌生与熟悉、传统之单纯的对象性与对传统的隶属性之间。”^①那么,如何建构起这种张力关系呢?只有通过“会话”或“对话”。如果我们集中于经典诠释的话,那么,在这种诠释活动中存在两大基本关系:一是主体与客体之关系,其中诠释者是主体,经典文本是客体;二是现在与历史之关系,诠释者代表现在,而经典文本则代表历史传统,而这两大关系都是“视界融合”关系、“对话”关系。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情况会阻碍视界融合从而建构起真正的对话关系?大致有两种基本情况:假设经典文本的“原义”是不变的或者说经典文本是“意义”之源,要变的是诠释者,诠释者通过调整自身以接近那永恒不变的“原义”或者说汲取“原义”,这表明诠释活动意义生成过程是由文本而诠释者的“单向”过程,也可以说“意义”被封闭在文本结构之中;假设诠释者主观心灵是“意义”之源,而经典文本最终只是一种触媒,在其触动、刺激下,“意义”从主观心灵中流出,这表明意义生成过程也是单向的,或者说“意义”被封闭在主观心灵之中了。这两种情况似乎截然对立,但相通之处在于两者都“歪曲”了经典文本与诠释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使其中的张力废弛。如果诠释者与经典文本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封闭的,那么这种关系就缺乏张力;如果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开放的、双向互动的,则相互之间便富于张力。只有在必要的张力中,理解、诠释活动才能成为意义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而诸种视界之间的互动、融合也就是一个不断循环、意义不断生成的

^① 伽达默尔,杜特.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M].金惠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7~18.

过程。

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而言，我们若采用传统的“史”与“论”结合的说法，那么，诠释活动就不能满足于或由“史”而“论”或由“论”而“史”的一次性过程，“史”与“论”应进入多次的不断循环之中：“史”往往是在一定之“论”下展开的，而“论”应该是从“史”中发现、提炼出来的，只有在“史”与“论”的双向的不断循环之中，“论”的主观片面性才会不断地被修正，“论”的视界才会不断地被开阔，而“史”的丰富性才会不断地得以展示，进而“史”才会真正成为使现在之“论”变得视界开阔、思想丰富的源源不断的文化精神力量。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研究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学科创建之初，在学科发展本身的内在规律性要求与唯科学主义的双重力量的作用下，重视文献收集整理而近乎客观主义的路数占上风，今天来看，这种客观主义、历史主义的研究态度功不可没。一方面，只要不单纯停留于文献考证，略有分析、诠释就必然会出现一定的视界融合；另一方面，随着文献收集、整理之趋于充分，古代文论研究学科内部自然而然就产生重理论分析乃至重构之趋向。但如果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古代文论研究应进入“论”的阶段，“史”的研究相对不再重要的，则就大谬不然。文献的整理、排比、罗列并不等于就是“史”，“史”也并非毫无生命力的遗迹，“史”乃是存在于现在之“论”中而需要我们与之融合的一个基本的文化视界，“史”的研究不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而是一个可以开阔“论”之视界、使“论”获得思想丰富的重要途径。如果说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已取得的成果，是传统与现代、古与今视界融合的产物的话，那么，我们觉得这种视界融合还处于相对粗浅的层次，并且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割裂支离之弊，因此需要进一步把这种视界融合推向深入，追求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深度视界融合，在此深度视界融合过程中，古与今、现在与传统的割裂关系才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传统文论之于当代文论的文化原点精神以及文化开启力量才会不断地被释放出来，最终，我们才有望建构起既属于现在的又与传统血脉相连的具有我们民族自身品格的、体现文化自主性的文学理论。

更为重要的是，从哲学上来说，传统的意义诠释理论体现的是主体本体论与客体本体论之二元对立，而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既非客体本体论也非主体本体论，而是视界融合本体论、对话本体论。^①也就是说，“意义”并不先在地存在于视界融合与对话之外，其既不先在地存在于经典文本结构之中，也不先在地存在于诠释者主观心灵之中，而只能存在于视界融合、对话之中。这一点正体现了西方哲学的某种当代精神，如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间性”论就与此相通。如果在古典诠释活动中真正体现了良性的视界融合、对话，那么经典文本、历史传统对于诠释者来说就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经典文本并非是对诠释者视界的限制，而恰恰是对诠释者视界的扩大。伽达默尔曾经强调：“通过与他者的相遇我们便超越了自己知识的狭隘。一个通向未知领域的新的视界打开了。这发生于每一真正的对话。我们离真理更近了，因为我们不再固执于我们自己。”^②诠释者主观视界的任意放纵恰恰无助于其视界的开放与扩大，因为这种做法只能表明诠释者封闭在自身的主观世界中，而近乎悖论的是：经典文本、历史传统视界通过对诠释者主观随意性的限制，反而可以有效地开阔诠释者之视界。以此来看，如果我们非要说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下一步的中心任务是什么的话，那么，就是既不单纯在“论”也不单纯在“史”，而是在于“史”与“论”之视界融合。

总之，我们认为，传统文论的当代价值在于：一是可以拓展现代文论的视界，二是可以展示人类文学思想的无限丰富性，而缺乏此两点，恐怕很难创造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文学理论。此两点在今天全球化语境中尤其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那么，我们该如何推进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良性的、深度的视界融合呢？讨论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是如何以中华文化元典精神为本根，通过贯通古今来传承发展中华几

① 伽达默尔，杜特·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M]，金惠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② 伽达默尔，杜特·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M]，金惠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1。

千年光辉灿烂的文论思想,以及如何使百年来的中国现当代文论在既有成就的基础上调适文化向度,以会通的姿态汲取传统资源,以“回乡”的文化喜悦心情与传统实现接续,汇入中华文论思想的历史长河并成为其中波澜壮阔的一段。

四

多年累积而来的古代文论研究中需要反思的问题,主要有这么两个方面:一是往往把移自西方的问题视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上的“元问题”,从此出发,中国古代文论最多就只是西方文学理论的注脚;二是使中国古代文论脱离其产生的语境而牵强附会于某种西方理论。如果说西方提供“理论”,中国古代文论提供具体的例证材料,通过对这些片段摘取的材料“强制阐释”来证明西方文论的“元理论”意义的话(此即所谓“以西律中”),那么,在这种研究格局中,“西”与“中”之间就只是一种单向作用的依附关系,严重导致中国传统文论自主视界的关闭,则相关研究中必不能形成真正的古与今、中与西视界的融合和文化对话。任何单向度的阐释都带有“强制阐释”的嫌疑,都是非视界融合阐释,势必大大削弱阐释的有效性。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西方文论当然存在相通之处,但是文化时间的不同(独特的历史)与文化空间的不同(独特的地域),又必然使它们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究竟为何或许很难找到唯一准确的答案,但是仿照西人艾柯的说法,在“以西律中”之中,哪些做法或说法明显地掩盖了其中的差异,我们则是相对容易确定的。比如以所谓“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贯穿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史,就明显地掩盖了中西文学思想之间的差异。或者说,我们虽不能指出贯穿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史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答案或许并不是一种),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绝非贯穿其始终的主要问题则是显而易见的。

再如从诗学思想史来看,今人大多以为唐人反对齐梁诗风是反其“形式主义”,此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未必是中国文学思想在那一历史时期自身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大致说来“经生”如王通辈是很反对形式主义的,但王通等经生之思想对盛唐诗的影响相对较小,恰恰在盛唐之后王通思想似乎才被真正重视。初盛唐时期的“文人”“诗人”所关注和所标举的是“建安风骨”,而齐梁时期的诗人对诗歌语言形式的重视所体现出的文化精神并没有被唐人反对掉,而恰恰是被大大发展了,比如唐人并没有中断对诗歌格律形式的探索和创造,而是大大发展了诗歌格律形式,将其推向成熟之境。不管怎么说,以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来描述齐梁人与唐人诗学思想之不同,是龃龉难安的。我们甚至不能说齐梁诗只重形式而不重内容,大致说来齐梁诗歌也基本上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而唐人追求的也就不是在所谓齐梁诗歌空洞的“形式”之中加进去丰富的“内容”,在唐人看来,与齐梁诗“形式”相统一之“内容”是“风骨都尽”的萎靡不振之气,而盛唐人追求的乃是风骨遒劲的壮浪豪迈之气。有学者认为唐以前中国诗学自身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文”与“质”,而到了盛唐此一问题似基本解决。“文”与“质”这一对范畴,与西学所谓“形式”与“内容”确存在交叉之处,但也确有相异之处,比如“文”与“质”同时也可以指甚至更大程度上就是指重“文采”与重“质朴”两种不同的风格。从总体上来看,古人更推崇“质朴”风格,但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在古人文学观念中强调“内容”压倒“形式”等等。之所以说盛唐后文质问题基本解决,或许在于:1. 风格更加多样化了。比如释皎然《诗式》中的风格论就不再是文质二元之分了(当然此前的《文心雕龙》风格论就已非二分法了,但其论又不仅仅局限于诗歌);2. 更多地关注诗歌的语言功能了。比如更加关注诗歌不同体式的不同特性,再比如中晚唐诗格论中出现的“体”与“用”之论,就不同于文质之论了。再后来,明代格调派标榜唐诗而反对宋诗,那么,宋明诗学思想之分歧点在哪里?今人多有把格调派视为是一种“形式主义”诗学观,那么,试问:为明代格调派所反对的宋代诗学思想之主导趋向就是“反形式主义”?这似乎很难站住脚。又如另一种通行说法以为宋人重新创明人重复古,但这一说法未必就能讲得通,比如宋代江西诗派“点石成金”“脱胎换骨”之家法不就分明也是一种复古之法吗?其实,宋明诗学路向之分恐怕在语言功能,比如所谓“点石成金”“脱胎换骨”云云所重视的是“炼字”“炼句”和“炼

意”，可以说着眼点主要是语言的语义功能，而标举格调的明人所重视的则是“炼声”，即重视语言的语音表达功能也即对声情表达功能的开掘，如此等等。再如敏泽先生在其相关研究中指出的那样，追求“神似”似乎是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个重要的趋向，但是中晚唐以前中国诗学恰恰主要标榜“形似”，其后“神似”思想才逐步发展起来，至于明清而成为蔚为大观之“神韵”说。事实上，“神韵”说大概很难用西方文论中的“形式”“内容”关系理论来解析了，“形似”与“神似”之说也就绝非“形式”与“内容”二分说所能完全范围的了。或者说，相对于“形式”与“内容”问题，“形似”与“神似”才是中国诗学自身更为关注的问题。那么，中国诗学自身关注的问题究竟为何，以及如何从原始文献中提炼出属于中国传统诗学自身的问题，这显然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因此，通过以上粗浅的分析大致足以表明：至少所谓“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不足以成为中国传统诗学所关注的主导问题，但是在我们现代以来通行的文学理论教材、文学史教材之中，移自西学的“形式”与“内容”关系问题几乎成为一个统领全局的“元问题”。

总之，回到文化原点要求我们矫正、增强“问题意识”。为此，首先要打破认为西方文论中的问题就是文论所应涉及的普适性的元理论问题的迷思，同时要深入沉潜到中国古代理文论的原始文献之中，深思之，明辨之，真正发现和提炼出属于中国传统文论自身的问题。当然，发现和提炼中国传统文论自身的问题，绝非易事，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对西学的不断尾随中，理论上的提问和自设命题的能力逐步趋于弱化，然而这却应是古代文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一个重要方向。有了这种自主的问题意识，传统文论研究才或可有望有所突破。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理论问题，乃是我们真正形成基于本土文化立场上的自主性研究视界的重要前提条件。

回到文化原点，要求古代文论研究要回到中华文化语境中来。我们研究和撰写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史，应该在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丰富而庞杂的传统文论典籍进行现代阐释的基础上为之，这其中便存在着一个历史还原的问题。这里所谓历史还原，主要如下两个方面的旨意：一是讲求古今视界融合，知人论世、忠实文本，准确地理解把握古人的意旨，以使所阐述出来的内容符合古人原义；再就是要将研究对象放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中进行纵向和横向的考察，看所研究的文论家、文论典籍在哪些方面因袭沿用了前人的观念，哪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新见和创设了新的话语，为文学理论批评史增添了哪些新的内容，由此而给研究对象在文论史上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此之为“双重历史还原”。当然，我们主张“回到还原”，强调的是研究中要有一种“入乎其内”的文化心态，即深入传统文论的纵深处，所针对的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的研究中“出乎其外”的文化心态持续太久太久了这一现象。大致说来，“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之间也应形成一种“诠释学循环”。所以，我们今天倡导“入乎其内”并非是从之以复古主义的姿态，要把研究的目光完全封闭到传统的视界之中，也并非认为早期研究中的“出乎其外”毫无价值，而是为了在两者间建构起必要的张力，促成它们之间的视界融合。“入乎其内”是为了强化古代文论研究视界的自主性，因为只有真正具有自主性的文化视界，才能与其他文化视界形成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深度融合。因此，我们强调“回到还原”之目的，最终并不在“复古”而在“创生”。因此，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充分关注：

其一，回到传统学术史语境。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一大特点是文史哲浑融不分而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视界，然而现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大特点则是以移自西方的文学理论观念体系话语模式来改造之，将其从其传统的文史哲合一的学术共同体中剔解出来，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分离，分门别户另起炉灶“过日子”，并且过分地强化其学科的独立性，以致出现了与传统学术史语境脱节严重的现象。比如对传统古代文学批评史或传统文论通史的书写，在非常讲究学科分疆划界的现代学科体制影响制约下，对历史典籍材料的择取必须是“文学”的，只有那些能适用于建构、“改写”性书写的材料才能得到采撷，文献材料的搜罗范围更多地拘泥于集部之尾的“诗文评”类范围之内，其他的多弃而不

用,而今天看来,这种作法是需要进行反思的。不管怎么说,这样显然大大缩小了传统文论研究的范围。另外也直接影响到了今人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在中国传统学术格局中的定位,一种常见的逻辑是:诗文评处于四部中最后一部集部,而且还在集部的最后面,属于集部的“尾巴”,由此可见古代文论在传统学术中的地位是如此之低。实际上,这种推论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如果我们宽泛地说文学评论首先主要是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分析的话,那么,对《诗经》的解读、评论是不是一种文学研究?其中有没有文学理论批评思想成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对《诗经》研究的绝大部分文献恰恰不在《四库全书》集部之尾的“诗文评”中,而是在排在四部之首的“经”部中,如此,我们何以能证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传统学术系统中地位就绝对地低呢?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构建和学科划分,打破或曰拆解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参照西方学术体系而得以建立,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则是基本仿效西方文学理论的模式而建,基本的文学观从西方文论中移植而来,而西方文论中的“审美中心论”的影响至今影响犹烈。或许有人会对上面的质疑反驳道:在经部的《诗经》研究要么是为了封建的意识形态服务而腐陋不堪,要么是仅仅只作技术性的小学研究(这又涉及到学科分化问题),不如传统诗话重视审美品味,因此经学营垒中的《诗经》研究不入传统文学批评史是应该的。然而,我们不禁要问:1. 史实真的如此吗?2. 即使真的如此,只有强调审美特性的文学研究才能称之为“文学研究”吗?如此等等。当然,学科分化更重要的影响是在学术思维方式方面,经过一番“纯化”后,古代文论被从其具体所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和学术史语境中抽离出来,然后把抽离出来的这些材料置于西方文论的模子中进行冲压塑型,将其嫁接到西方文论的枝干上,使用西方文论的观念、方法、术语对其进行阐释,其中出现方枘圆凿的情形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我们提出回到学术史语境,主要是强调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要回到影响制约了其生成和发展演变轨迹的传统学术史即经学、史学、子学等思想史语境中来。因为传统文论的基本思想与传统经学、史学、子学思想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我们经常讲古代文论研究要深入到哲学史、学术史的层面,但是此所谓“哲学”“学术”首先应该是与传统文论同生共长的中国传统哲学、学术。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学术运思、诠释方式、述学手段等方面,就应该多多地汲取传统学术的长处并传承和发扬光大,以使我们的研究更加“中国化”一些,而在文献搜罗上要则应该由“醇”返“杂”,扩大文献资料的爬梳和使用范围,高度重视那些广泛分布在经史子集中的除“诗文评”而外的文学理论批评资料。在处理不同学科关系时,我们更是要拆除现代学科划分而形成的相互之间的樊篱,尽量打通文史哲三者,在这方面钱钟书的研究实践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我们应该以之为楷模,深入学习领会。总之,回到传统学术史语境,无疑将大大有益于从最为基本的学术思维方式上增强古代文论研究的文化自主性和中华学术品格。

其二,回到传统文学史语境。就文艺学研究领域的古代文论研究而言,多年来,所呈现出的一个特点是在联系文学史、联系具体的文学创作来谈文论方面做的较弱,往往仅满足于抓住传统文评中的只言片语进行纯理论析解,而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活动与文学创作、作家和作品联系紧密,这一点与西方文论更多地呈现为一种“纯理论”形成鲜明对照。其实在早期的古代文论研究中,如郭绍虞先生等还是比较重视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的互动关系考察的,但是随着移自西方的文学理论之影响日渐扩大,话语权利日渐扩张,古代文论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之间就渐渐拉开了距离,而当批评史或曰文论史脱离文学史而成为一门独立自足的学科时,这在客观上就必然会形成古代文论研究中的“去文学史语境”现象,而随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越分越细现象的出现,文论史、批评史与文学史之间的距离便越来越大,于是脱离文学创作谈文学理论,脱离文学史谈文论史,在文艺学研究范围之内,便成为一种常态。脱离文学史语境的古代文论研究,又影响到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对文论文献材料的取舍,由于看重的是纯理论抽绎,所以对传统文学批评文献资料中的偏重于“评”的、“论”的那些材料格外青睐,而对于偏重于“赏”的、“本事”的材料,以及对那些选本、注解材料,则往往以缺乏思辨、没有理论而不入法眼。然而,我们知道,古

人言谈对于文学的认识,并不仅仅通过对诗文的直接之“评”“论”来表达,而且还通过诗文赏鉴、本事记事,已经选本、注解等途径来表达。比如,在以往的文学批评史书写中对《文选》鲜有关注,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对唐代诗人和诗歌创作产生影响最大的恐怕首先还不是六朝时期哪一种、哪一家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而影响最大的正是这部《文选》。再如元代人所选的唐诗选本《唐音》对明代格调派诗学思想的影响恐怕也要大于某种具体理论,而要考察清人沈德潜的诗学思想恐怕也不能仅仅只研究其诗话著作《说诗碎语》,而且还要研究其《唐诗别裁》等等。在新近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选本批评”也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的运作方式。再有,在古人所作的许多对典籍的注、疏、正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字上的疏通,也有许多义理阐发,包含着丰富的文学思想,因此也极具理论价值。新近有学者提出古代文论中的“注释批评”,再如所谓“杜(甫)诗学”研究文献应到“千家注杜”之“注”中去搜罗,这些见解均值得充分重视。再比如罗宗强先生等的中国文学思想史著作,也非常重视在古代文学创作实践中发现和提炼文学思想,也可谓是对文学史语境的高度重视。脱离文学史语境可以说也是“以西裁中”的一种曲折表现,因此,回到文学史语境也是强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视界自主性的一重要途径。

其三,回到传统价值论语境。我们对于古人的文学观念的理解与评判,应该充分关注和了解古人言说时的价值论语境,否则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评说上就可能出现以今人的“高见”来责难古人识见之低下,盛气凌人于古人之上。比如,我们在研究中凡遇上古人的“教化”“载道”言说,往往皱眉表示不满,以显今人反封建之思想高姿。但是,我们却不愿承认所谓“教化”“载道”其实也是文学的本位价值的一部分,只是每个时代所主张、所强调的“教化”“载道”的具体内涵不同而已。因此,我们在研究评价中首先需要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主流文学思想表示出必要的“理解之同情”和“同情之理解”,然后再评说其在当下的价值意义,而不应该是以批判、声讨来代替具体的学理分析,甚至以不屑的口吻诋毁历史,轻蔑古人。罗根泽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言》中便针对此中情况予以评说:“五四的学者,因为时移事改,知道了古人之传统的载道观念曲解历史,却不知自己也正作曲解历史的工作;不过不依据传统的载道观念,而改依五四的缘情观念而已。”又言:“譬如编著中国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者,如沾沾于载道的观念,则对于六朝、五代、晚明、五四的文学或文学批评,无法认识,无法理解。如沾沾于缘情的观念,则对于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的文学或文学批评,无法认识,无法理解。”罗根泽还指出:“但因时代意识所造成的主观成见,则以我们得时所厚,可以祛除。我们亲自看见五四以前的载道文学观,亲自看见五四的对载道文学观的革命,又亲自看见五四的缘情文学观被人革命。使我们的主观成见,由时代意识造成,又由时代意识祛除。这并不是我们比古人聪明,是古人没有见过象我们这多的时代意识。假使见过这多时代意识的我们,仍然自锁于一种胶固的时代意识以编著史书,致使历史的真象,无法显露,不唯对不起历史及读者,也对不起时代及自己。”^①这里所引的这些话语,即在今天也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历程来看,其中偏重于强调审美和偏重于强调载道两种文学思想同时并存,并且时常发生相互间的观念纠结和论争,但是从总体来说,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史和传统文学价值思想史上少有极端强调审美独立性之语,并且从来没有占据过主流地位,而过于偏执地强调极端工具论之语,也不占主流地位。其实,强调审美与非审美的二元对立,在西方也是近代以来才形成的,以此来裁判中国传统文论既是文化空间上的错位,也是文化时间上的错位。经世致用文学价值观念是传统文论的基本思想之一,而依据现代性的审美独立立场来对此加以鞭笞,则完全是游离于传统价值论语境之外的话语暴力。从纯审美立场出发轻蔑传统“教化”与“载道”之说,其认识的偏差是掩盖了文学活动的多维性。当然,对以西方审美中心论裁剪中国古代文论作批评性反思,并非是在否定审美在文学活动

^① 以上引罗根泽语,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0~25.

中的价值,而是为了说明文学活动除审美之外还有其他的向度,正是多维度的文学价值指向构成了人类文学思想的多样性、丰富性、可能性。

因此,我们认为,在对传统文论文献典籍进行整理和阐释时,应该充分重视文本原始语境,同时还应该将其置于当时思想文化、文学创作、价值论语境中作历史性的分析。这实际上涉及我们对传统文论作现代阐释之时,如何缩小乃至消除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思维习惯与传统的知识特点、思维义法之间的文化差异的问题,故而还是一个视界融合的问题。对于古代文论如何进行“现代转化”的问题,有许多不同看法,而我们的看法则是应以视界融合为前提,通过创造性的阐释,发掘传统文论的深度意蕴,充分认识传统文论的思维特征、基本范畴、话语形态,同时发现传统文论的当代价值,创新性地转化,使其能参与、融合到当代文论话语系统中来。凡此种种,均需要处理好古今之间的视界融合问题。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的丰富性及当代价值意义的展现,当代中国文论思想和理论视野的拓展,均将得益于古今视界融合这一理念与方法。“六经责我开生面”(王夫之语),为我们深厚的文学理论批评传统“开生面”,乃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同时,使传统文论在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得到传承和发展,也是创新性发展具有文化自主性的当代中国文论所需。

Back to the origin: Further thoughts on the mergence of perspectiv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al work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DANG Sheng-yuan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ry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mergence of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s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the research ideas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but also with the academic methodology. I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inheritance as well as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the humanistic spirit in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which highlight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cultural self-conduct,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Phenomena occurring in previous researches that require being reflected upon make it necessary for us to further strengthen our awareness of the problem of “the mergence of perspectives”. When recogniz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spiritual sense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y, we need to set up a sens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strengthen ideas of cultural roots and hold the academic method and idea that goes back to the origin of culture. Specifically speaking, we need go back to the context that features the academic history, literary history and value theory of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break the myth that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s a universal meta-theory, pursue the in-depth mergence of “cultural horizons”, ancient and modern, and figure out the tens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hich has puzzled the scholars for a century, so as to straighten out the inheritance and order of cultural roots that underlie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ry theories. Only on this basis ca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keep benefiting contemporary ones. Only truly independent cultural horizons can merge deeply and creatively with other cultural horizon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cultural origin; hermeneutic circle; cultural horizon; mergence of perspectives

[责任编辑: 杨育彬]